

澳大利亚历史

(原名《牛津澳大利亚历史》)

1942—1988

【澳】杰弗里·博尔顿 著 李尧 译 王瑞 校

·北京·北京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博尔顿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本书是他最近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以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大量的史实，精辟的论述，透彻的分析向人们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46年间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了澳大利亚作为新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所在。作者见解独到，是一部有特色的历史专著。

前 言

最初提出将澳大利亚一部分学术著作翻译成汉语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是澳中理事会前执行主席瓦尔特·古德先生。选中的第一本书就是博尔顿著《牛津澳大利亚历史1942—1988》，一是由于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一是因为作为第一本介绍澳大利亚的书，首先让中国读者了解当代澳大利亚，也是顺乎情理的。从酝酿到最后成书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我们邀请曾经译过多部澳大利亚长篇小说和传记、经验丰富的副编审李尧先生（他同时还是一位作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担任这部书的翻译，又请王瑞研究员担任审校。在审校过程中，王瑞先生曾与我多次交换意见。交稿前，我又将译稿通读了一遍。我的印象是这是经过认真翻译仔细审校的一部有学术水平的书稿。

这部书的出版恰好在中澳正式建交二十周年之际，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我们相信，这部学术著作对于中国人民了解澳大利亚的历史和现状都会有所裨益。

《牛津澳大利亚历史1942—1988》是澳大利亚学术著作汉译系列丛书的第一本，今后我们还将陆续组织其他澳大利亚学术著作的翻译，促进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

澳 大 利 亚 历 史

此书的出版得到澳中理事会的资助和北京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这里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澳大利亚学术著作汉译系列丛书主编

胡文仲

1992年11月

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目 录

第一章 发现自我的边缘(1942年—1951年)	(1)
一、战争时期的人民	(1)
二、设计蓝图的人们	(29)
三、实用主义占了上风	(65)
第二章 罗伯特·孟席斯的太平盛世(1951年— 1965年)	(97)
一、收与支	(97)
二、作为澳大利亚人	(122)
三、富国政治	(154)
第三章 探索新方向(1966年—1975年)	(183)
一、忠实的同盟者	(183)
二、新的方向	(211)
三、光辉的变型	(241)
第四章 运转基本正常(1975年—1988年)	(275)
一、努力向上	(275)
二、走向200周年纪念日	(303)

第一章 发现自我的边缘

(1942年—195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头几年，澳大利亚似乎有可能踏上发现自我的边缘。就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时期。过去的黑暗与未来的光明以令人眩目的反差交织在一起。有一阵子，激情与偏见坠入低谷，精神之勇与希望曙光初露。

布鲁斯·格兰特
《澳大利亚的困窘》

一、战争时期的人民

一个半世纪以来，看来未必成功的尝试似乎可以奏效。英国人从土著居民手中夺取了西南太平洋这块最大的陆地之后，从16000公里之外遥控着澳大利亚，并且把自己的种族植根于这里。97%的澳大利亚人声称自己祖籍英国，但是到1941年，人口仍然很少；在这块7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一个人，而且人口主要集中在几个沿海大城市。澳大利亚人一直为他们这块大陆的空旷所困扰，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与充满潜在威胁的外部世界有了更密切的接触。这时，人们的反应是

焦灼不安。雄踞于太平洋、印度洋和南大西洋的交汇点，澳大利亚位于扩张必由之路，成了英国最强大的对手——美国和日本——为寻求更大的经济与政治势力而必得之地。

不仅仅是日本军国主义和东南亚市场冲突的前景给澳大利亚带来威胁，当有声电影使得人们对美国生活方式有一些肤浅的了解时，美国似乎也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一支劲旅。大多数老一代澳大利亚人仍然把自己看作是英国的亲密盟友，并且依赖于英国。“如果我们不是有钱可以借给别人的大英帝国的一个分支，”一位南澳大利亚农民——政治活动家1945年大声疾呼，“这里至今还是澳洲土著人的天下。”英国资本和英国文化造成了这种变化，但是澳大利亚作为英帝国主义远方前哨阵地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澳大利亚对于英国的依赖将被对美国或者日本的依赖所取代——也许这种依赖在形式上不那么明确，但同样无孔不入。这种依赖将在多大程度上被成熟了的民族个性以及由国情所决定的社会和经济的自身利益所减轻，仍然是留待未来回答的重大问题之一。

有的人看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特别是那些年轻诗人和艺术家。他们已经开始敦促澳大利亚人相信本民族的经验。A·D·霍普^①在一首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诗里，表达了自己对这样一个时刻的期待——澳大利亚人不再理睬“有教养的猿猴饶舌/尽管这叽叽喳喳的叫声在那里被冠之以文明的头衔。”指导思想并非产生于城市“五个脓疮”^②，而是来自历来涌现先知的荒漠。拉塞尔·德莱斯代尔的绘画抛弃了用以表现东南沿海田园风光的柔和的蓝色与绿色，转而描绘干旱贫瘠的内陆，在这一背景之下，人物形象显得孤寂而矮小。49年代，呼声最高的小说是埃莉诺·达克的《永恒的土地》。这部书最成功之处是前面那些描写悉尼地区还完全是

译注^① A·D·霍普(1907—)澳大利亚著名诗人、评论家。

^② “五个脓疮”(“five wounds”)指澳大利亚五个州首府。

“土著人领地”的章节。有一些青年诗人掀起了津迪沃罗巴克运动^①。这场运动旨在寻求如何把土著人的意象“嫁接”到当代诗歌创作上去——尽管做得太牵强了点儿。

这样的运动要想在教育界得到响应显然为时过早。尽管英国教育对学校课程的影响深远,这时也做了一点让步。学校的读物不但包括丁尼生^②的《溪水》和《绅士,约翰·哈利法克斯》的片段,他们还给孩子们介绍吉本马球俱乐部,让他们了解年轻的赶羊人哈利·戴尔的悲惨故事,甚至给孩子们介绍约恩·伊德里斯的《拉塞特的最后一次骑马旅行》中的故事。学生们也许不得不记一记英格兰煤田的地理位置,读一读查尔斯一世的故事和他的造船费,不过他们之中相当多的人还颇为欣赏对于自己国家那些栩栩如生的描述,以及G·V·波特斯在《1606年以来的澳大利亚》中那些滑稽的线条画。

大多数成年的澳大利亚人对于更为广阔的世界的了解是通过报纸得到的。除了悉尼和墨尔本以外,每天一份晨报便包揽了所有重要新闻的来源。过去,对于海外事件的报道比今天详细,不过这些报道几乎全部是由坐落在舰队街的新闻机构折射过来的。澳大利亚人是从远方来了解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只有14%的人在海外出生,大部分生在联合王国。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尤其是妇女,从来没有出过国。对于许多人来说,加利波利半岛^③、埃及以及西部战线是他们曾经到过或者希望涉足的仅有的海外旅游之地。尽管到1939年,快达航空公司和英国皇家航空公司每星期

译注^① 津迪沃罗巴克运动(Jindyworobak movement) 澳大利亚40年代吸收和融合土著文化的文学创作运动。

^② 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年) 英国诗人, 重视诗的形式完美, 音韵和谐, 词藻华丽, 于1850年被封为桂冠诗人。

^③ 加利波利半岛(Gallipoli) 位于土耳其西北部, 在达达尼尔海峡与爱琴海之间。

都有一次飞往伦敦的航班，去欧洲旅行的为数不多的有钱人绝大多数还是走水路——从弗里曼特尔^①出发航行四周或从悉尼出发航行五周。在40年代的国家领导人中，亚瑟·法登^②和本·奇夫利^③在成为总理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澳大利亚。奇夫利年过40才离开新南威尔士州。约翰·柯廷^④到国外旅行过一次——参加192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劳工组织会议。罗伯特·孟席斯^⑤40岁的时候才以首席检查官的身份访问了伦敦，并立即陶醉于乔治五世^⑥银婚纪念的盛大宴会。他春风得意，和上流社会的达官显贵一路周旋，为赢得他们的赞许而沾沾自喜。他甚至没有机会以学者或者旅游者的身份去体验一下英国或者除他自己国家之外任何一个国家的普通人民的生活。R·G·凯西之所以在政治上声名显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为一个20年代富有的在上层社会关系很多的年轻人，他曾是澳大利亚驻伦敦的联络官，了解不少大人物的隐私。保罗和亚历山德拉·汉斯拉克在30年代之所以成为一对与众不同的夫妇，因为他们不但在欧洲呆过一年，还访问过东南亚。越南战争期间，他是从事公务并且真正关注过这个陷入困境的国家的极少数几个澳大利亚人士之一。

尽管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贸易国依靠国外市场和投资，像埃辛顿·刘易斯、W·S·罗宾逊这种在国际范围内周旋自如的商人仍然为数甚少。大部分人都狭隘保守，这是因为殖民主义统治而形

译注① 弗里曼特尔(Fremantle)澳大利亚西南部、佩思附近的港口。

② 亚瑟·法登(Arthur Fadden)澳大利亚总理。

③ 本·奇夫利(Ben Chifley, 1885—1951年)澳大利亚总理(1945—1949年)。

④ 约翰·柯廷(John Curtin, 1885—1945年)澳大利亚总理(1941—1945年)。

⑤ 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 1894—1978年)澳大利亚总理(1939—1941, 1946—1966年)。

⑥ 乔治五世(George V, 1865—1936年)爱德华七世的次子，在位期间1901—1936年。

成的性格。“当这么多老人身居要职的时候，年轻人很难找到用武之地。”弗里德里克·埃戈里斯顿写道。托马斯·巴克兰德爵士在19世纪70年代查特斯堡^①淘金热时发迹，89岁时是新南威尔士州银行的董事长，直到1947年99岁去世时，还担任着董事。约瑟夫·米切尔直到1967年93岁去世的前一年，还影响着伯恩斯·菲尔波的命运。就是年轻一代也不是容易接受新思想的。1932年，E·W·诺克斯85岁时放弃了他对殖民地糖业加工公司的控制，由非力普·戈尔德芬奇爵士继承他的事业。戈氏几乎比诺克斯小整整40岁，但是他不折不扣地继承了诺克斯对工会和社会福利那种根深蒂固的敌意。澳大利亚商界的领袖们大都居住在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在1941年以前的1/4个世纪里，他们从来用不着迎合只延续了两年多的工党政府。因此，保守主义盛行。

大学也不会提供新的或者能够震撼人心的东西。许多澳大利亚最杰出的学者离开祖国远走他乡。W·K·汉柯克、马克·奥利芬特分别是他们那一代最优秀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都在伯明翰大学工作，而那个城市唯一比悉尼和墨尔本优越的地方大概就是和大城市联系更为密切。留在澳大利亚的有影响的人物尚有约翰·安德森——一位难以对付的、持怀疑论的悉尼哲学教授，以及R·M·克劳福德——他把历史当作伦理学范畴的东西教给墨尔本一代大学生。可是这些人如果一旦打破传统的思想，就会被无知的政客大肆攻击。《公报》嘲笑悉尼的历史学家S·H·罗伯茨，因为他预言要跟希特勒打仗。那时候跟现在一样，“共产主义者”只不过是说哪怕具有一丁点儿独立思想的人大加诽谤的拈来之词。澳大利亚社会里新的激进“分析家”，如布雷恩·菲兹帕特里克和P·R·斯蒂芬森，大都在大学以外活动。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

译注① 查特斯堡(Charters Towers)，城镇名，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曾为重要采金业中心。

(ABC)在它成立的头10年里在传播澳大利亚文化方面已经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却被禁止播发有争论的观点。澳大利亚人被保护着不受任何不安分思想的侵袭,对相互竞争中种族传统的矛盾与妥协一无所知,一心依靠英国的保护和指导,实际上是狭隘僵化的表现。

这种狭隘僵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即1939—1941年有所削弱。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澳大利亚志愿军作为英国的援军参战,在1940年6月法国沦陷之后的危机中,为英国在纳粹德国的突然袭击之下幸存尽了绵薄之力。澳大利亚飞行员驾驶着许多架轰炸机和战斗机蔑视纳粹空军对英国领空的控制。第六师、第七师以及后来的第九师在埃及和利比亚作战,抗击了敌人三次大规模的进攻。顶住敌人长达7个月围攻的“图卜鲁格耗子”^①里许多士兵是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1941年德军入侵希腊和克里特岛的时候,澳大利亚人受命抵抗未能奏效,但是稍后他们在叙利亚抵抗维希^②的法国人却获得成功。这一系列事件虽然在澳大利亚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但那还是一场在远方进行的战争。商业、政治和享乐在本土一如既往。1941年12月日本的参战才突然并且永远打破了澳大利亚人的狭隘僵化,而1942年2月中旬新加坡的沦陷更粉碎了这种“偏安一隅”的梦想。

对这样一场巨大的灾难,澳大利亚有思想准备的人很少。日本人进攻神速。1941年12月8日,澳大利亚听到了轰炸珍珠港的消息。两天之后,英国在东南亚水域的主要战舰被日本飞机击沉。圣诞节时,香港在一片奸淫虏掠的惨景之中陷落。这种景象极其生动地显示了取得胜利的侵略者就是如此凶残。日本人在马

译注① 图卜鲁克(Tobruk)利比亚港口。

② 维希(Vichy)法国中部城市,古罗马时代起的温泉疗养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贝当(H·P·Petain)傀儡政府所在地。

来西亚长驱直入，只遇到了准备很不充分的抵抗。在2月份的第一周便占领了英国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新加坡。人们希望新加坡能坚持6个月，结果只10天便陷入敌手。尽管不乏英雄主义，人们认为有些澳大利亚部队还是轻易地放下了武器。投降之后，澳大利亚指挥官陆军少将高登·贝奈特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逃之夭夭。被俘的士兵中有15000名澳大利亚军人，大多数属第八师。他们将在章宜和臭名昭著的缅甸铁路上熬过三年半的苦役，在此期间将近一半人死亡。

“新加坡的沦陷为澳大利亚拉开了战斗的序幕”，2月16日约翰·柯廷总理说。三天之后，炸弹第一次落到澳大利亚的土地上。军心不稳。对达尔文^①第一次轰炸之后，洗劫接踵而来，包括军人在内的大批难民逃往内地。一位名叫杰克·基尔福伊尔的养牛人说，有些人“几乎歇斯底里”。他是在凯瑟琳的一家酒馆里碰到他们的，而这座小镇距离被袭击的地方有350公里之遥。3月里，达尔文·温德姆和布鲁姆几次遭到空袭。与此同时，日本人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荷兰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统治，并且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登陆。在澳大利亚，部队参谋机构的首脑们开始准备对付敌人入侵的紧急秘密计划。他们告诉政府，如果日本人派来一艘航空母舰和一支训练有素的海军航空兵分队，便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们。最坏的设想是，从阿德莱德到布里斯班这条线以外的大部分土地必须放弃。这条线就是有名的“布里斯班线”。

听到这番忠告的是还不曾经过考验的工党内阁。他们执政仅仅4个月，靠了两名无党派阁员的支持才保持了多数。内阁成员只有一个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另外3人参加过布尔战争^②)，

译注^① 达尔文(Darwin)澳大利亚北部港口。

^② 布尔战争(Boer War):1899—1902年英国人与布尔人之间的战争。

3个人曾在内阁短暂任职。大多数成员在政治上一直把精力花在争论如何调整经济萧条的30年代产生的社会不公上面，很少有人认真研究过国防、对外政策或者战争期间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约翰·柯廷总理，一位57岁的前新闻记者，正是因为在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激烈地反对征兵，才脱颖而出。作为国家领导人，他的潜力到底有多大还是个未知数。可是在以往的6年里，作为在野党的领袖，柯廷在统一派系纷争的澳大利亚工党的过程中，充分表现了他的耐性、圆滑以及保证自己的意图得以实现的巨大的天才。至少他的3位阁员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卓越的气质：J·B·奇夫利，财政部长，从前是个铁路工人。他在沉稳和娴熟的管理技巧背后，隐藏着一个对特权疾恶如仇的坚硬的核心。H·V·伊瓦特，首席检察官、对外关系事务部长——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前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最年轻的法官——除了政治上的判断能力以外，知识分子天才的禀赋样样具备。还有J·J·戴德曼——英国移民执拗的代表，现任战时工业部长。这些移民试图靠辛勤劳作于贫瘠的农田维持生计，直到经济大萧条才打破了梦幻。国防部由忠诚而又富有经验的副总理F·M·福德负责。此人经常因其无关大局的虚荣心被人讽刺，但又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实干家，在他那个部门工作，无能就是灾难。抉择就这样落到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同事头上。自从欧洲人在这里定居以来，澳大利亚似乎第一次面临战争的威胁。

澳大利亚拥有一支由18个空军中队组成的保卫本土的空军，其中3个中队曾经在马来西亚作战。还拥有一支海军，在1941—1942年的短短几个月内就损失了五艘巡洋舰中的三艘。一月，第六师和第七师由埃及召回去保卫爪哇^①和苏门答腊^②，留下第九师在

译注① 爪哇(Java)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大岛，在苏门答腊岛和巴厘岛之间。

② 苏门答腊(Sumatra)印度尼西亚的岛屿，位于西部。

阿莱曼^①扮演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角色。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迅速推进,澳大利亚政府在2月中旬决定,这几支已经颇有作战经验的部队需要保卫他们自己的祖国,并且请求他们的护航队改道而行。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试图把澳大利亚人的注意力转移到根本没有希望取胜的缅甸战役上,以此拖延他们在危险重重的印度洋上的航行。但是柯廷坚持把他们调回来,并且忍受着这一决定给他个人带来的烦恼,直到他们安全返回。这几支有经验的部队从国民军(CMF)得到了补充。国民军因为只限于在澳大利亚本土服役,有时候被人们戏称为“巧克力士兵”。国民军中最好的部队都像澳大利亚皇家部队(AIF)那样优秀,可是有些驻扎在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军队却懒惰、涣散,正规部队的军官对他们的素质非常失望。作为保卫家园的警卫部队,澳大利亚还组建了一支志愿军。这支军队的成员从在城里清闲惯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到昆士兰北部地区的牧羊人——他们兴致勃勃地想象自己将是隐藏在溪谷与高山之间骚扰敌人的游击队员——应有尽有。澳大利亚就是以这样的实力,面对节节胜利的、职业化了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

市民们准备应付紧急情况。政府鼓励学校和老百姓挖防空壕预防空袭。公园和开阔地都挖了公用防空壕,上面盖了木板,再覆以泥土和沙袋。店铺前面都加了铺板,以防炸弹爆炸引起的冲击波,用强制方法执行灯火管制。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涌来的难民被安置到凡是有床位的公寓和旅馆。1942年4月,一份报纸的民意测验表明,只有54%的被测试者承认,他们将面临被侵略的危险。不过也许还有许多人不愿意承认他们的恐惧。珀西·斯彭德那年暑假快结束时游览了棕榈海滩,发现那地方所有富足的居民

译注^① 阿莱曼(EI Alamein)埃及北部海岸, 盖塔拉洼东北角北部的旗。

部“突然搬到悉尼最西面几乎连一个人影儿也看不见的地方（除了……渔民、店主和少数别的什么人以外）。”堪培拉比大多数澳大利亚城市更因害怕遭受侵略而担忧。用美国大使尼尔森·约翰逊的话说，“不论走到那儿，你都觉得澳大利亚准备不放一枪就举手投降。如果有可能离开这个国家，人们都会逃之夭夭。有一阵子，交通全部阻塞。”

只有美国可以作为澳大利亚的后盾和保护伞。新加坡沦陷一个星期以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菲律宾吃了败仗的美军司令，奉命来到澳大利亚。4月，他成为太平洋地区盟军的最高司令，总部设在墨尔本，4个月之后迁到布里斯班。因为这个地区大多数部队由澳大利亚人组成，托玛斯·布莱梅将军任陆军司令，而美国人指挥盟军的海军和空军。年届62岁看上去却很年轻、颇有权威且生气勃勃的麦克阿瑟（他在最典型的热带气候条件下也从不出汗）很快就赢得了柯廷和他的同事们的信任。他们和美国人合作得很好，很少干预他们指挥这场战争。也许对日本人的恐惧确实有利于麦克阿瑟恢复其军人的名誉，也有利于柯廷政府建立其政治上的可靠性。但是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威胁，柯廷还是予以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在1942年5月，命令武装力量准备对付日军一旦登陆之后实行的焦土政策。对于这项命令，麦克阿瑟表示赞同。与此同时，从中东调回来的那几支有经验的部队由国民军补充之后，又投入新几内亚战役。当第六师坐着蒸汽火车，经过7天的行程，穿越澳大利亚，从墨尔本到凯恩斯^①的时候，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在维多利亚，”一位士兵回忆道，“当地人送给我们鸡和火腿；在里弗赖纳，排骨和牛排；在沿海各地，牡蛎、对虾和鱼。不管走到哪儿，都让我们把水果、糕点和布丁带着上路。”

译注① 凯恩斯(Cairns)澳大利亚东北部港市。

第一章 发现自我的边缘(1942年--1951年)

这几支部队的返回减轻了人们的焦灼情绪。不过，5月底，日本人的潜艇侵入悉尼港，并且炮击了海滨附近的住宅区，几天之后又在纽卡斯尔^①故伎重施，悉尼的士气也因此动摇。到了7月底，监察员们报告，尽管离前线最近的地区还徘徊着战争的阴影，全国大部分地区浮动的人心已经趋于平稳。在杰拉尔顿^②，一本逃跑路线图汇编成册，内地城镇的居民被告知贮存3个月的食物，许多女人领着小孩儿搬到乡下，住进空店铺或者农场的棚屋。但是市政委员会做出决定，不负责处理空袭中死难者的遗体。迟至1943年5月，J·C·麦克唐纳德，昆士兰州最北部小镇劳拉的一位店主，在给他英国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敢肯定，如果敌人胆敢入侵，我们一定会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

紧急状态期间，持不同政见者和少数民族的公民权受到限制。不少于6780名澳大利亚人作为有潜在危险的外国侨民而被拘留。这些人一多半来自意大利，包括已经取得澳大利亚国籍很久的市民和应征自愿加入皇家部队的弟兄们。他们的农场和生意因无人照管而蒙受损失，他们的妻子儿女饥寒交迫，放逐他乡。在昆士兰州埃奈斯菲尔区，教育部门关闭了一所小学校，因为教师的食宿只能安排在意大利人家里。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也被拘留，有时仅草草审判一下。1942年2月和3月，联邦政府当局逮捕了20多个“澳大利亚第一”运动的成员。这些人认为，保卫澳大利亚就是废止对英国或者它的帝国统治的义务。他们之中有两个人被关进监狱，另外两个无罪释放。这两个人是因为可疑的告密者控告他们煽动暴乱而获罪的。其余的人未经审判就被关了几个月到两年的时间。1945年，一个皇家委员会发现有8个人没有正当理由而被拘留，应当赔偿其损失。同样的骚扰也加诸于“耶和

译注^① 纽卡斯尔(New Castle)澳大利亚东南部、新南威尔士州的港市。

^② 杰拉尔顿(Geraldton)澳大利亚西部港市。

华的见证人”头上。这是一个具有和平主义倾向的教派。他们的教义禁止将人类的法律凌驾于上帝之上。为了这些具有颠覆性的见解，这个教派组织从1941年1月起一直被取缔，直到1943年3月，高等法院就此提出质问才解除禁令。他们的孩子被维多利亚州的小学校开除，因为父母不允许子女向国旗敬礼。澳大利亚共产党于1940年被取缔，直到1942年12月，在苏联作为主要的同盟军参战将近18个月之后，才恢复合法地位。

没有因为这些少数民族问题而受困扰的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发现，尽管到1942年上半年，对于战争最令人坐卧不安的焦虑已经过去，本土的种种禁令仍然继续着。6月到8月之间，对棉布、茶和糖实行凭票供应。7月，南澳大利亚禁止了赛马，关闭了赌券经营所。别的州试行每个月有一个星期六停止赛马的规定，唯一的结果是对赛马下赌注的人感到失望，纷纷跑到酒馆狂喝滥饮，酗酒者大增。8月，柯廷劝告他的澳大利亚同胞要以节俭为新的生活方式。“这样做，”他说，“我们就会成为一个精神与道德都重新武装起来的民族……不但可以应付战争的重任，也可以应付和平的需要。”柯廷作为一个为和平进行不懈努力的人和他作为一位信守原则的战时领袖一样，自己心甘情愿地信奉苦行主义。不过，尽管这场提倡艰苦朴素的运动使国民超额认购了1亿澳镑的战时公债，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并不认为有必要接受如此严格的道德规范。

他们发现可以抱怨的事情太多了。严格的汽油定量配给迫使开车的人不得不用让人很不满意的煤汽发生炉来代替。各州之间的旅行受到限制，公共交通十分紧张。运输问题使得那些已经供应不足但还没有实行配给的商品日益短缺。许多住在郊区的人们恢复了老一代简朴的生活习惯。他们翻起草坪种蔬菜，或者在后院养几只鸡鸭。礼帽、背心和双排扣上装不再是中产阶级男人制